



▲ 2011年5月9日，埃及开罗，基督徒举行游行示威。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大有向埃及全社会蔓延的危险。

# “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

文/刘中民 张卫婷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已三个多月。埃及先后建立过渡政府，修改宪法，确定议会和总统选举时间表，试图进行政治重建，基本上避免了政治失控。

但是，埃及政治地震的余震仍然接连不断，其政治生态依然十分脆弱。当前，各种政治力量的竞相角逐，时有发生游行示威，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宗教冲突，前景堪忧的穆巴拉克家族命运，内政外交转型的巨大压力，都使埃及仍然处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

## 各派角逐

埃及政治重建的焦点是“去穆巴拉克化”，其核心是通过修改宪法，

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构建新的国家模式。在此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以谋取对埃及未来的主导权。

从目前的态势看，由原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演变而来的“新民族党”，由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和正义党”，由各种分散、多元的力量构成的自由派三大政治势力，将对埃及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穆巴拉克辞职后，军方接掌政权并建立过渡政府，同时通过提高工资、平抑物价、稳定汇率等措施，初步稳定了社会基本面。但是，由于内阁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被视为穆巴拉克的“影子”，在强大的压力下，沙菲克于2011年3月3日被迫辞职。同

日，军方授命原运输部长伊沙姆·沙拉夫组建新的过渡政府。

为尽快去除穆巴拉克的影响，军方于2011年2月25日组织建立了由11人组成的专家小组，在未经公开讨论的情况下，很快抛出宪法修正草案提交全民公决，其内容主要涉及总统候选人资格、总统任期、选举司法监督、议员资格确定、副总统任命和紧急状态等条款。根据这一宪法修正草案，埃及总统任期将缩短至4年，且只能连任一次；总统应在就职后60天内任命副总统；选举应在司法监督下进行。2011年3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以77.2%赞成的巨大优势通过了宪法修正草案。

当然，围绕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也传出了许多杂音。西方媒体多认



各种政治力量的竞相角逐，不断的游行示威、暴力和宗教冲突，让面临内政外交转型的埃及，在“革命”胜利后仍处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

将分别向议会和总统转移立法和行政权力。

“新民族党”的党魁是已故前总统萨达特的侄子塔拉特·萨达特。萨达特已表示希望寻求该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但问题是“新民族党”能否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

2011年4月30日，穆斯林兄弟会宣布组建“自由和正义党”，其目标是角逐新一届议会中45%到50%的席位。穆兄会此前透露的目标是角逐议会30%的席位。新目标增加了角逐的席位，显示其对自己的民意支持信心充足。

自1954年被政府列为非法组织以来，穆兄会成员一直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议会竞选，在最近一次即2005年人民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成员赢得五分之一席位。埃及《金字塔报》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贾迈勒·贾瓦德认为，穆兄会政党与穆兄会在形式上分离，有意掩盖其背后的宗教性质，以便能顺利注册成为合法政党——埃及法律不许成立宗教性质的政党。

在自由派中，多个青年团体已宣布将成立政党，但新政党能否团结一致，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宣传自己，获取民间支持并将之转化为议席面临诸多困难。

由此可见，在当前埃及的各派政治势力中，穆斯林兄弟会是最为成熟的政治势力，而其他力量则相对较为分散。但是，穆斯林兄弟会面临的挑战也不容低估，如何团结世俗力量，如何对待科普特基督教徒，如何处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军方的关系都是其面临的挑战。过于与世俗化力量靠近会动摇其内部团结，过于强调宗教色彩会招致世俗化力量乃

至军方的掣肘，是穆斯林兄弟会最难以平衡的难题。

## 困扰埃及转型的诸多难题

当前，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依然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并突出体现为如何实现政治与社会稳定，如何处理穆巴拉克家族，如何实现经济复苏，如何重塑地区大国的国际地位等一系列的内政与外交难题。

第一，埃及陷入大规模社会动荡与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以群众抗议示威为表现形式的街头政治已成家常便饭。目前，埃及人已经习惯于通过街头抗议向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导致穆巴拉克垮台后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仍时有发生。

埃及社会治安持续恶化，越狱、袭警、足球流氓等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威胁民主的和平建设进程。据外媒报道，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至少发生了5起越狱事件，成功3起；革命以来共24000名犯人越狱，其中8400人仍在逃；6600件从政府军火库里盗走的武器流散各地。

另外，日趋严重的宗教冲突严重威胁埃及的政治稳定。2011年5月7日，开罗市一贫民窟发生了科普特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严重流血冲突，其原因是逊尼派穆斯林试图解救因改变信仰而被基督教徒扣押的一名妇女。事件共造成1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还有两座教堂被焚。

此后，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冲突大有向埃及全社会蔓延的危险，引发了多次血腥的流血冲突。当前，埃及宗教冲突已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对埃及军方和临时政府调解社会和谐、维持

为，宪法修正案的顺利通过与穆斯林兄弟会和民族民主党的联手有重要关系，宪法修正案的第二章强调“伊斯兰法是埃及法律的主要基础”，部分满足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要求，进而赢得了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众的认可；但这一条款却遭到了科普特基督徒的反对。然而，公民在投票时只能选择全部接受或者全部反对，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前，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应与宪法修正案关于伊斯兰教法的条款有重要关系。此外，在投票过程中，反对派领袖、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之一巴拉迪，在投反对票的时候遭遇到瓶子和石头的袭击，也凸显了主张世俗化的反对派的尴尬境地。

2011年3月底，军方仓促宣布启用新宪法，并宣布议会选举将延期至2011年9月份举行，而总统大选将于同年11月举行。在大选完成后，军方

国家稳定的能力构成了严峻考验。

第二，如何处理穆巴拉克家族仍是埃及现政权面临的棘手课题。

2011年4月9日，民众以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方式要求严惩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以及前政府高官，引发了穆巴拉克下台后新一轮大规模抗议和示威。4月14日，饱受非议的军政府宣布，拘押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并开展针对其贪污和滥用职权指控的审讯。

4月16日，最高行政法庭宣布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解散，所有党产充公。法庭还下令在全国一切广场、街道、图书馆和其他公共设施中清除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和夫人苏珊的雕像及名字。5月6日，临时政府判决前内政部长哈比比·埃尔阿德里犯贪污罪入狱12年并处400万美元罚金，此外还面临非法杀戮的指控。

但是，针对穆巴拉克的审讯则进展不顺。穆巴拉克在接受审讯时突发心脏病，被送医院诊治。此后，临时政府试图从其夫人苏珊身上打开缺口，结果苏珊在一周后进行的审讯中也因心脏病发作送医院救治。目前第一家族仍被无限期拘留候审中。穆巴拉克夫妇先后突发心脏病，被反对派和外界舆论视为过渡政府有意包庇穆巴拉克家族。

此外，穆巴拉克家族目前在埃及仍然不乏支持者。4月26日在埃及官方电视台大楼前，大批民众仍高呼穆巴拉克是“民族英雄”。由此可见，穆巴拉克家族的命运仍然是牵动埃及政治神经的敏感问题。

第三，受到重创的埃及经济复苏乏力，考验埃及现政权执政能力。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本来满目疮痍的埃及经济再遭投资锐减和旅游业衰落的双重打击。

有媒体报道，埃及累计国内财政赤字为1710亿美元，约为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73%，其中2010-2011财年约为220亿美元，已经超出60%的临界点。本财政年度结束的6月底通货膨胀将达14%，今年12月底将更达20%，失业率维持在10%，失业人口900万，贫穷比率70%，6%为赤贫。

进入今年5月份以来，宗教冲突加剧了埃及不安定因素，进一步冲击了旅游者和投资者的信心。5月8日埃及股市大幅下跌，达到3月24日重新开市以来的新低。

第四，重塑地区大国的外交努力困难重重。

埃及过渡政府虽然强调继续执行埃及前政府签订的一切外交条约，但为了摆脱过去过于依靠美国以及亲以色列的外交形象，埃及已经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力图重塑其地区大国的国际形象。

首先，埃及已明显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力度。2011年4月底，埃及决定永久开放拉法口岸，使得货物和人员可以不再受以色列的监督而自由进出加沙地带，以缓解“巴勒斯坦国的封锁和苦难”。这表明埃及在加沙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在以色列看来，这是埃及对过去与以色列警察共同采取封锁行动以削弱哈马斯这一政策的放弃。

5月初，在埃及的斡旋下，巴勒斯坦内部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和解。对此，埃及外交部发言人门哈·巴胡姆强调指出：“我们在翻开新的一页。埃及正在重新发挥它一度放弃的作用。”

此外，最新的一份民调显示，大部分埃及民众希望终止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的戴维营和平协议。在1000名受访的埃及人中，有54%希望取消该

协议，主要原因是巴以争端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有36%的人同意保留该协议。

4月底，在埃及西奈半岛北部阿里什市南部的天然气管道发生剧烈爆炸后，埃及正准备提高供应以色列天然气的价格，以平抑民众的不满。

其次，埃及与伊朗的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埃及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继埃及革命过程中伊朗军舰获准穿过苏伊士运河引发外界纷纷猜测后，埃及与伊朗在4月19日举行了外长级会谈，再度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纽约时报》评价指出：“埃及的转变很有可能改变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让伊朗获得与此前不共戴天的敌人接近的新机会，同时拉远埃及自身与以色列的距离。”

埃及东方战略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穆斯塔法则指出，埃及与伊朗的关系回暖并不与双方的政策和利益相违背，也不意味着埃及需要伊朗，或者说接受伊朗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干涉，沙特和阿联酋等国也都与伊朗有着密切的外交和经贸往来。但外界普遍认为，埃及和伊朗复交是大势所趋，建交只是时间问题。

上述态势表明，埃及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明显的“去穆巴拉克化”的特点，但埃及的巴以政策，无疑有可能使埃及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从阿以冲突抽身后再度陷入巴以冲突的困扰之中，使埃及再度背上巴勒斯坦问题的沉重包袱，同时也会恶化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而埃及与伊朗的靠近也会导致埃及与美国矛盾的激化。■

（刘中民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张卫婷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0级博士生）